

自我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追尋*

施正鋒

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族學院院長

我到底是誰？我一直好奇著自己的個人認同，卻不知道理何在。我一向把民族主義（nationalism）當作本身的研究興趣之一¹，也自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者（Taiwanese nationalist），也就是深信「台灣人應該雙手建立自己的國家」。

「民族認同／國家認同」（national identity²）是一種自我認同（self-identity），這不只是個人的認同而已，更是一種集體認同（collective identity）。就一般人的了解，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的特質，譬如說「這個人缺乏國家認同」、或是「這個人的國家認同有問題」。問題是，在回答「甚麼是恰當的國家認同」之前，更基本的課題是，到底一個人的國家認同是如何養成的？

* 發表於白鷺鷥文教基金會主辦「2009 蘆葦與劍研討會——土地與認同」，台北，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，2009/6/23。一反往昔，筆者在本文使用「我」、而非「我們」；此外，也把參考文獻的引用儘量降到最低。

¹ 在政治學的比較政治之下。我目前還是「族群暨民族主義研究學會」(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) 的會員（總部設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）。

² 就政治學、或是社會科學來說，national identity 大概是相近的概念，意思是 nation's identity、或是 the identity of nation，是指一個 nation 的特質。那麼，甚麼是 nation？簡而言之，這是指一群認為福禍與共、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的人。一般將之翻譯為「民族」，不過，有些人為了要表達隱含的（denotation）國家關聯、而且要避免原生的血緣絃外之音（connotation），主張改稱為「國族」。既然由 nation 所建立的國家稱為 nation-state、national state、或是 nation's state，翻譯上就會衍生贅牙的「國族（的）國家」；同樣地，national identity 必須譯為「國族認同」。我們以為，國族這個概念不免有「由國家而來的族」，也就是由 state 到 nation，用來和家族、族群、以及民族（漢民族）區隔；然而，就 nationalism（民族主義、或是國族主義？）的精神來看，是指這群想要生活在一起的人，有權利擁有共同的一個國家，也就是由 nation 到 state。也因此，有人逕自將 national identity 譯為「國家認同」。

其實，在政治學上又有 state identity、state's identity 或是 identity of the state 的用法，顧名思義，是指「國家的認同」，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定位、以及他人對於這個國家的看法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這是指一個國家的特質，與先前所提的 nation 的特質卻是迥然不同。複雜的是，國家認同又往往被解釋為「對於國家的認同」（identify with the state），儼然國家才是主體、而個人只是隸屬於國家的個體，違反國家是因為人而結合的真諦，也不符「自我」認同所強調的自我意識（self consciousness）。

我們會發現，目前台灣所面對的國家定位、以及族群分歧等盤根錯節的議題，或許有幾分悠關 state identity，不過，更基本的應該是 national identity，也就是台灣的住民是否有意願生活在一起、共同組成一個現代國家。我們以為，在社會上對於漢字翻譯尚未達成約定俗成之前，沒有必要為了要規避一般人尚未熟悉的 nation 概念，自我陷入文字障，硬生生將兩個不同的概念作相同的翻譯。換句話說，何不大膽使用「民族」、「民族主義」、以及「民族認同」等用詞？在這裡，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穿插使用。

究竟「民族認同／國家認同」是如何產生的？就理論上看，有原生論、結構論、以及建構論三種解釋。原生論³（primordialism）是指認同來自於共同的血緣、語言、宗教、或是文化等本質（essence），因而是生下來就決定的，並不容許個人有自我選擇的空間；這是命定式的認同觀，認為後天的努力是改不了自己的認同。而結構論⁴（structuralism）強調的是認同如何在不平等的結構下凝聚而成，特別是負面的共同歷史、集體記憶、或是經驗⁵，因此，被動、外塑的成分多於自我反思。相對地，根據建構論⁶（constructuralism），認同是一種集體的想像，因此，會隨著情境而高度變動；這是自主的認同觀，不甘心自我被天生的特質所擺佈，也就是說，個人的認同應該是決定於自己的選擇。

逡巡於原生的羈絆

當我開始懂事的時候，是在苗栗縣三義鄉的建中國小，雖是外地人，卻很自然地學會了客家話，老師同學熱情待我，也因此比一般鶴佬人更了解客家人的想法。迄今，我還可以聽得懂七、八成的客語，只不過因為大學裡在宿舍與香港僑生住了四年，與廣東話混淆了，不太敢開口成句地講，只剩一些字彙來馬馬虎虎，倒是母親還是一口流利的客家話。不過，客家朋友一直沒把我當外人看待，不管是學術活動、還是一般聚會，總是會想到我；感謝客家朋友對我的熱情接納，讓我一直覺得相當溫暖，儘管我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血統。

如果從血統來看，我的外祖父是日治時代由南投草屯到後山台東去發展，最後落腳於花蓮玉里，應該算是鶴佬人。對我來說，幼年住過的玉里是香格里拉般的地方，外來

³ 由於持這種看法的人，往往會想要追求「真正」的、「純粹」的「本質」，又稱為「本質論」（essentialism）。

⁴ 有時又稱為「工具論」（instrumentalism），把觀察的重點放在菁英的政治動員，因此，聽來多少有操弄的指控。

⁵ 包括二二八事件、或是南京大屠殺、日本殖民統治、或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。

⁶ 最有名的學者是 Anderson（1991）。相關論述的整理，見 Grande（2000）。

的族群在此與原住民族相處和好。我的外祖母姓賴，應該是客家人⁷；母親從小與其外祖母生活，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的媽媽，記憶中會說客家話。我在出國前曾與外祖母聊過，她承認先祖來自中國廣東梅縣，其阿公原在屏東擔任漢人通事，後遷徙台東墾殖。不過，我猜測其母系有平埔族人 *Makato-Siraya* 血統，因為家族中的女性比較有地位；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名字就叫「番婆」，毫無一點掩飾⁸。可惜，我已經沒有機會相她當面證實了。這種 *ainoko* 混血的本質，孕育出最漂亮的母親及外祖母，又有幾分日本風味。

其實，平埔族比現在大多數的原住民族可憐，從清治時期就飽受漢人的歧視及強迫同化，除了土地被蠶食鯨吞而流失，更不敢承認自己的身分，連起碼作人的尊嚴都沒有。當然，這是尷尬的認同，因為我無法證明我的平埔血統，正如大多數在戰後被國民黨政府否認存在的平埔族一樣，即使物質上的溫飽不缺，心靈上的空虛卻無法填補。不過，雖然漢人看我「番番」，原住民朋友倒不嫌棄，長期視我為兄弟，一起打過幾場轟轟烈烈的戰役。

我對於原住民的認知，除了小時候在玉里的長鏡頭印象，再來就是父親提及二二八時陣，南投山上的原住民年輕人如何搭 *tolkagu*（卡車），呼嘯經過霧峰大街，前往台中支援起義的學生。父親說，當時要不是祖父緊緊抓住，伯父也會衝出去加入他們。這一幕生命共同體的經驗，雖非天生，卻讓我永遠無法忘懷。我真正親身與原住民接觸，是在金門當排長的時候；當時，除了我自己的排副有一半血統以外，連上的原住民不是放在砲組、就是分配到我的排上。吃苦耐勞是他們最明顯的特性，不論是堆砌水庫、構築碉堡、或是演習，原住民是我能信賴的兄弟。在 2008 年，有幸受邀到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暫時濫竽充數（塞縫），回到娘家，對於原住民的信任，只有心存感激；當然，還有相當的贖罪動機，也就是原漢、以及平埔族與高山族之間的歷史齟齬。

從父系這邊來看，我們算是鶴佬人；父親與我都是在台中霧峰出生的，不過，這裡其實是曾祖母的外家。古早的姑娘真可憐，原本是家族安排的聯姻，卻因丈夫英年早逝、

⁷ 後山的客家人有兩路，北路來自桃園、新竹、還是苗栗，南路則來自屏東。

⁸ 究竟是公所的戶政人員惡意給的、還是父母坦然命名，已經無法查證。

大伯無情欺負弟媳，她只好賣掉房產離開傷心之地，回去投靠娘家。在日治時代，阿罩霧是人文薈萃之地，尤其是文化協會的發源地。祖父是遺腹子，從小沒有看過自己的父親，卻有一個領導群倫的四舅——林獻堂——他對異族的抗拒，讓我也無由地自豪起來。祖父由長榮中學到東京醫專，雖然是鄉人尊敬的醫者，卻仍有難堪的認同，畢竟，這裡是林家開墾經營的所在，不是我們的本家⁹。

與台灣大多數姓施的宗親一樣，我們原本來自彰化鹿港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鹿港施(死)一半¹⁰」。如果由姓名排行的第二個字來看，我們大概是施琅的後代，他的兒子施世驃又打朱一貴；好一個漢奸世家，讓我一直有莫名的原罪感，覺得非替台灣人作一些事情才可以彌補。據說，台南將軍原本是施琅的封地，又有將軍溪經過，卻因風水抵不過吳將軍，只好舉族遷徙鹿港。內人就是將軍人，岳父是海軍官校出身，鄉人稱吳將軍；世間人的安排真奧妙。

我一直無法了解，為何當年曾祖父的遺體要運回廈門安葬？為何作妻子的沒有過問的權利？曾祖父兄弟商賈出身，厝裡開行郊錢莊，曾祖父捐官文學、其弟武舉。近年有畫冊刊出兄弟們與林獻堂合照的相片，文字說明竟猜測為福州商人！到底他們應該是算台灣鹿港、還是中國廈門的商人？對十九世紀的他們來說，現代的民族國家尚未在東方出現，他們由東洋縱橫到南洋，猶如行走灶腳一般，更不用說台灣海峽；他們娶日本某、溫州媽、南洋婆。不管是滿洲人、日本人、還是國民政府，對他們來說，都是必須虛與委蛇的統治者。日治時代，他們還可以在海峽兩岸行走；戰後，有些人選擇前往新加坡、菲律賓，更多的人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只好落腳在台灣。

師大林玉体教授是將軍人，有一回說我們是「假施」。這裡有兩種解釋，一是認定施琅為漢奸，不願接受其後人為漢人。另一種說法是我們的血統真的不是漢人，他甚至於舉當地民間的說法，這些人的頭額及鼻樑跟別人不同。我回家一看我的父親、幾個叔

⁹ 換句話說，嫁出去的女兒在族譜上是沒有名份的，除了斑駁的老相片，只有老一輩口中「四姑娘」、或是「四姑」的記憶。

¹⁰ 另一句是「社頭蕭(肖)歸庄」。

叔，大家的鼻子特別挺，再翻開祖父、曾祖父的老相片來看，也是同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。只不過，是不是只有我們家如此，還是鹿港姓施的都是這個樣子¹¹？

我曾經到澳門開會，廈門大學的幾個學者不約而同告訴我，泉州有許多長得像我這個樣的人，據說祖先是唐朝由大食而來。寧非統戰的伎倆？我拿鏡子來照一照，左看又看，真的不像周遭的人。原來，久聞祖先在大航海時代把帆仔船當籌碼在玩，一直以爲言過其實，竟然是真的有歷史的背景。

過去，我小學唸了五間，唸沒多久就要換學校，國中、高中各唸了三年，彷彿是度日如年，而大學四年，若非要追日後的牽手，恐怕也覺得日子難捱。恍然大悟，原來我竟然是阿拉伯人的後代，骨子裡脫不了游牧民族的根性？然而，如果我們不是台灣人，當前中東有這麼多阿拉伯人國家，我們又要認同哪一個呢？

台灣意識的萌芽

沒有一個人是天生的民族主義者，那麼，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想究竟是如何產生的？或許跟大多數的台灣人／「本省人」一樣（？），我出生在一個反國民黨的家庭：經歷過日本人半世紀的殖民統治，大家好不容易盼到自己的同胞，卻又要忍耐不平等的待遇，幻滅中又帶點無奈；對於國民黨體制，拒絕參與就是無言的抗議，不願提供任何會增加統治者正當性的機會；當然，對於「外省人」隱約流露的優越感，加倍努力代表著在精神上作競爭。不過，對於自來睥睨外來政權的台灣人來說，傑傲不馴的個性對於民族意識的產生，既非充分條件、也非必要條件。

在過去，台灣的學生有機會接觸民族主義，是正式的高中國父思想／三民主義課程。回想當時課本所灌輸的「官式民族主義」，除了再三強調國民黨政權的法統以外，

¹¹ 我在海外唸書，時常被韓國留學生當作同胞。在台灣，也時常被誤以爲是日本人；我在剛回國之際，曾在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課，早稻田畢業的蔡啓清教授初次見我，還以日語打招呼。我在幾年前到日本參觀演習，移民局一直以日語問話，折騰半天才獲得允許入境，原來是認定我是日本黑道人物、潛逃取台灣護照而回。也有人幫我宣傳，說我是蒙古人的後裔；是褒？或貶？

蔣中正的東西其實可能不少於孫中山，並無法真正了解孫中山的思想；更令人難以接受的，是課本被拆成一題一題的考題（或者說，課本是根據考題拼湊而成的），要參加聯考的人就要乖乖地要死背，就好像滿洲人以科學制度羈靡漢人一般。對於高一、二是唸甲組的我來說，真是苦不堪言¹²。

生性好奇的我，設法從台北買到一本精裝的原版《三民主義》（中央文物供應社），就民族主義的部分，讀來倒也言之成理。以現在的觀點來看，孫中山要作的就是建構一個超越漢族的中華民族，也就是 Benedict Anderson 式的「想像共同體」。可惜，只不過因為愚蠢的洗腦方式，讓一般人誤以為所有的民族主義論述都是僵硬的教條，進而間接妨礙到台灣民族運動的推動。

如果說許信良是口中掛著民族卻反對民族主義的人，前總統李登輝則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台灣民族運動者。其實，我們儘可以反對擴張性的中國民族主義，並不一定就因此要否定台灣民族主義。只要「田無溝、水沒流」，只要中國人不要妨礙台灣人進行自己的共同體想像，中國民族主義並不一定要與台灣民族主義相互對立；相對地，任何阻礙台灣獨立建國者，都是台灣人的公敵。

在思想箝制、物質缺乏的時代，台中只有一家位於中正路的老字號「中央書局」比較有規模，它出版的洪炎秋《閑人閑話》、葉榮鐘《小屋大車集》等雜文集，多少夾帶一些台灣人的意識¹³。黨外人士黃順興是彰化人，他的短文集充滿對弱勢者的關懷，最後選擇流亡想像中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¹⁴。其實，除了吳基福的《台灣時報》，家父一

¹² 話說回來，也因為三民主義只獲得六十來分，才得以「證明」自己不是唸醫科的料子，陰錯陽差進入被列於丙組卻又身分尷尬的台大農經系，從此，「當醫生革命家」的自我說服夢醒，終於開始悠遊社會科學；要不然，即使當年父母／家族首肯，憑我對「貝多芬」（背多分）的嫌噁，再萬年千百度也考不上社會組。更重要的是，要不是來到這裡，就不會遇到未來的終身伴侶。

¹³ 半山丘念台《嶺海微飆》的中國經驗則帶有異國情調，是弟弟最喜歡的讀物之一；父親一直有一個夢魘，擔心那些投共的台灣人會像戰後的半山一樣，會帶領共產黨來佔領台灣，想不到正在為事業打拼的么兒會日後莫名病死中國。李敖在台中一中唸過，是諸多無病呻吟的書籍中，少數膽敢挑戰當道者，不過，在抓小辮子、耍嘴皮以外，並不能提供學子正面的精神領航；我現在偶而會在路上碰到不再口沫橫飛的他，再想到當兵時金門，竟然可以買到他的書，最後卻在退伍時全部被郵局沒收，不禁莞爾一笑。

¹⁴ 不知他親睹中國對台灣文攻武嚇之際，對於霸權是否也有相同的搖頭。

直會買一些以自由民主在夾縫中生存的雜誌，依稀記得是由卜少夫掛名的香港刊物¹⁵；這些也不過是國民黨用來證明自己包容的樣版，等到黨外雜誌出現，沒有本土味道的刊物就註定要被淘汰。另外，祖父過身以後，他手尾留下林獻堂的三本線裝紀念文集放在我家珍藏，不過，裡面的台灣意識隱晦不明；民不與官鬥，這應該是林家下厝（清治）、頂厝（日治、國治）的先後共同結論。

台中一中的洗禮

阮的祖厝（老家）是在鹿港（四方院的前身¹⁶），不過，我們是在日本時代搬回（到）阿罩霧。在中小學階段，我們隨著父親住遍台灣、四處流浪¹⁷，最後，在彰化落腳，終究，還是選擇通勤讀台中一中，除了土地認同外，更重要的是父親是一中畢業的，讓我有強烈的回去唸一中的使命感。後來，即使台灣大學畢業，也去了美國拿到博士學位，然而，真正讓我覺得自豪的，還是一中的身份，特別是她在台灣的歷史地位。

我們都知道，台中一中是台灣人自己出錢出力所設立的學校，在此之前，台灣人只能讀教會辦的淡水中學、或是長榮中學¹⁸。具有台灣精神的我們也都不會忘記，當年只有日本人的學校才可以稱爲一中，雖然日本政府曾經試圖將台中一中改名爲二中，而我們的前輩就是不屈服，因此，在被殖民時代的台中一中，儼然是台灣民族意識（Taiwanese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）的重要象徵之一。如果要了解台灣民族運動的發展，一定要研究台中一中的發展。

其實，台中一中自來就不是一間地方性、或是區域性中學，自早就有來自全島各地慕名而來的英雄好漢；我在一中的期間（1973-76），同學中間除了有台中人，也有眾多來自彰化、以及南投的通勤生，更有來遠自苗栗、雲林、甚至於嘉義慕名而來者。對於

¹⁵ 依稀是《新聞天地》？

¹⁶ 四方院有四兄弟，其中，施江南醫者於二二八事件罹難。

¹⁷ 在那經濟崩潰的時代，醫生的兒子被迫念台中高工，當然是有百般的無奈。這種「欠栽培」的相對剝奪念頭，恐怕是不少人的集體經驗。

¹⁸ 我的祖父前往東京醫專之前，就是先唸長榮中學，當然，有受過基督教洗禮。

第三世界的國家而言，中學往往是跨越家鄉的第一個民族整合（national integration）機制¹⁹，再來，才是大學、或是當兵；不過在台灣，由於大學、以及軍隊受到國民黨緊密的控制，只剩下台中一中精神抗爭的傳統，讓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徬徨少年，開始有思想自由馳驅的空間。

在懵然無知的狀態中，我們隱約知道當年的學長如何與日本人抗爭，而戰後的二二八事件，一中人當然更沒有缺席²⁰。因此，不論是在大禮堂的週會、或是在操場的朝會，與教官作貓捉老鼠的周旋，是我們至少能進行的無言抗議。在圖書館裡頭，學長可以叫低年級的起立，我們會欣然讓位，只要不是那種要替學長擦皮鞋學、或是拳打腳踢的日式作風；這種不是國民政府帶來的傳統，反而是提醒我們有共同被殖民的經驗。

有一天，數學先生黃呈明忽然神秘地告訴我們²¹，有一本雜誌出版了，很可能不久就會被查禁，「卡緊去買！」我在一中大門左邊的一間書店買到創刊號，這就是《台灣政論》；果真，沒幾期就因為一篇文章而被停刊了²²。日後，省喫儉用買黨外雜誌，可以說是大學生活四年的寫照。

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中，我發現眾多的台中一中學長參與，讓我覺得身為一中人，絕對沒有讓台灣人漏氣。在 1990 年代中期，我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城（Columbus）秘密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，是一中的前輩施忠男介紹的，從此，讓一個卑微的讀冊人找到可以奉獻的一條路，頓然體會到生命更有意義。

不過，或許是因為台中一中過去的抗爭精神，讓國民黨對於台中嚴加打壓、防範，特別是拉攏一些一中出身的政治人物，難免讓外人產生被羈縻的印象。也或許是省政府在中興新村、以及省議會在霧峰的關係，長期大軍壓境，讓外人以為台中沒有骨氣；在重北、輕南的習慣下，中部往往是被忘掉的淪陷區。因為歷史脈絡（historical contingency）

¹⁹ 這或許可以解釋，為何台中同鄉會不像台南同鄉會那麼有凝聚力。

²⁰ 當然，我們會想到謝雪紅、以及二七部隊長鍾逸仁。

²¹ 好大膽，大概是自恃名師，不擔心同學中應該會有不少「外省人」。一直要到 2008 年，黃老師要寫回憶錄，才輾轉透過當醫師的同學通電話。

²² 二十多年後，我到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，終得以見到這篇文章的作者，也就是回國客座淡江大學的邱垂亮教授。

的制約，我們不敢臧否過去的政治人物如何做選擇，不過，具有台灣本土精神的一中人，我們既然不是幫兇，就應該為台灣的歷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或明、或暗，大家作伙來衝破外來統治所硬加的精神枷鎖。

民族主義思想的成長

在大學四年裡頭，我住的是以僑生為主的男七舍，本地生多半待了一年半載就升級到校園內的宿舍、或者乾脆搬到外頭去住。我一方面不願意增加家裡的負擔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裡天高皇帝遠，教官懶得留下過夜，打定主意就隱遁在蟾蜍山下²³。農學院是出奇地保守，據說，菜鳥教官都會先派到這裡見習，大概是以為農家子弟卡好拐²⁴。我們的軍訓課程是男女分開上，自從我在課堂向教官挑戰，委婉指出「國家≠政黨≠領袖」以後，敢跟我說話、寫報告同組的人，除了未來的牽手，就只剩下來自馬來西亞、說福建話的女生了；不知是因為彼此語言相通、還是農場實習之便，也不便明說。

在大學裡，我並非活躍的社團人。一天下課，回到宿舍，室長氣定神閒第告訴我，「警總找你」，卻害我下了一大跳，國民黨果真厲害，我才來唸沒多久，老大哥竟然就發現我心裡在想甚麼；第二天，才知道是天主教光啓社的社長姓「景」、名「種」，虛驚一場。因為到法學院修政治學、西洋史，才認識了一些「大學論壇社」的朋友，不過，似乎只有我選擇出國唸書，這些人後來大多加入民進黨²⁵。

²³ 由於香港僑生佔多數，學校特別答應訂了兩份香港的報紙；宿舍有成文的規定，只要過了午夜就可以任人拿走，別人是搶影劇版，我則悠閒地拿國際新聞版。慢慢地，我又晉級自己訂有學生優惠價的 *Time*；然而，英、法的殖民地早就在戰後獨立，只剩葡萄牙在民主化後倉促走人，內戰烽火的背後是美、蘇間的代理人戰爭，而中南半島的民族解放色彩又被意識型態之爭所掩蓋，民族主義的啓示不多。

²⁴ 我實在不好意思點破，並不是所有台灣人都有田可以種；其實，台灣在日治時代就已經接觸西方的現代化了，霧峰老家的巴洛克式的西洋建築早就有抽水馬桶。誰說「農家子弟不會出賣農民」？在帝俄時期，專門出賣搞農運革命份子給秘密警察者，往往就是最貧困的農民，此乃統治者慣用的分而治之技倆罷了！政治人物不要言必稱中共那一套「紅五類」台詞，老是用原生說法來當自我人格特質的資產，因為在戰後，大部分台灣人的日子都不好過，特別是剛被剝奪恆產、旋又遭到「四萬換一元」打擊的中產階級。要言之，台灣民族運動不只是要跨越族群、同時也要跨越階層，才有可能會成功。

²⁵ 其中，斷斷續續有聯絡的只有一個人，就是目前的台南縣長蘇煥智；回國後，由於新潮流對台獨聯盟遷台有意見、由昔日最親密的盟友演化為「土獨 vs. 洋獨」齟齬，我不便洩漏自己的身分，只好婉拒他伸出的雙臂，因而一直感到公私無法雙全的內疚。日後，他在立委任內與陳唐山縣長又為了濱南工業區

中壢事件、以及美麗島事件應該是點燃心中火苗的關鍵，從此，台灣人不再甘心作任人騎的奴才。記得在那一夜，我向另一個本地生室友（電影迷、新竹客家人）提到二二八事件，他認為一定是我捏造出來的，要不然，為何他從小到大都沒有聽過？第二天，大概是經過求證，他道歉了。當時，晦澀的新潮文庫拿在手上，是用來欺哄班上爪耙仔的偽裝，真正的精神糧食是一再被查禁、春風吹又生的各種黨外雜誌，譬如說，看得比較痛快的《美麗島》、以及較溫和的《八十年代》、《亞洲人》；只要《自立晚報》報導哪一本被禁，書報攤的銷路就特別好，洛陽紙貴而不一定買得到，連僑生朋友都不免感到好奇。另外，我在光華商場也搜羅了不少政論禁書，譬如《古坑事件》。那真是苦澀而又刺激的時代²⁶！

鄉土文學的影響應該不亞於政論文章，特別是楊青矗的工人文學、宋澤萊的農人文學；除了說年輕人本來就比較有理想、同情弱勢者以外，也因為他們的作品讓我體會到手足所遭受的結構性苦痛。我當時和幾個同學（包括現在任教母系的吳珮瑛），合作寫了一篇分組學期報告〈農民所得與農糧政策〉（被刊於系刊《金稷》），大體覺悟政治權力的重要性。在選修的「中國近代史」，我寫了一篇義氣凜然的〈從「鄉土文學」談起〉，老師胡平生好話說盡，硬要我自行抽回，勸我隨便再繳一篇就好；我就故意天馬行空交上了〈由「剛果暴風雨回憶錄」看剛果開國四要人〉，反正，殖民地的命運不外乎任人擺佈。

在那睡了四年的下舖頭頂上，我在上面的夾板下方神不知、鬼不覺地貼了三個人的名子：加里波底、孫中山、以及乃木希典。在義大利的建國三傑中，加里波底的紅衫軍罪瀟灑；孫中山則在中國革命成功後讓賢袁士凱，氣度何其大；乃木大將的兒子戰死日俄戰爭，何其無私。拋開遙遠的義大利不說，中國與日本正是台灣人在塑造民族認同所

相持不下，我雖心想尋求化解之道，卻仍苦無出路；那天，大家在南化不期而遇，或許不再靦腆，彼此卻已經不若少年時陣狂狷。近年，因為推動平埔族的原住民族身分，才又有共事機會。

²⁶ 巴基斯坦的文人總理布托在 1977 年被軍事政權吊死，許信良在《長橋雜誌》把他描寫成民主的殉道者，初生隻犢不怕虎的我，馬上寫了一篇文章〈布托——一個迫害反對黨的政客〉加以反駁，竟然能被刊出來。在立場鮮明的黨外雜誌一一被停掉之後，我在《縱橫月刊》寫了〈恒河下游的兒女——孟加拉〉，藉機介紹孟加拉的獨立經過。

必須面對的重要他者。

不管是日治時代、還是戰後的國治時期，中國一直是不少台灣人寄託心靈的祖國，也就是作為反現實的心理投射。我倒不會天真的相信，「國民黨的敵人就是台灣人的盟友」這種簡單的邏輯。在鄉土文學論戰之際，鍾理和、吳濁流的文章告訴我們²⁷，對岸的中國人也不會好到哪邊去。不管是中國國民黨、還是中國共產黨，這個想像的虛擬祖國與現實的國度，在真實接觸後都要幻滅。²⁸

日本人雖然給台灣帶來現代化，畢竟是殖民者。祖父是留日的，父母平日對話也會夾雜日本話，特別是他們不願小孩知道的事情。在宿舍裡，僑生會偷放「黃河」、以及「梁祝」的協奏曲，不知是否故意要製造耳濡目染的效果，我則還以包括「軍艦進行曲」在內的日本軍歌曲盤；其實，那種血氣沸騰的感覺，彷彿又回到過去選舉期間，聽到不怕死的黨外的候選人放這條歌，未必是對日本有所寄望。今天，再聽 CD 灌製的同樣進行曲，雖享用雙手去抓，卻已完全失去那種被迫害之下的英雄氣魄情境，難道是因為沒有昔日唱片的音響效果？

徘徊不去的結構性陰霾

回想，初次大量碰到外省人，是在霧峰國小，同學的父母有不少人在高等法院、教育廳上班，外省老師也有半數譜。在彰化市的彰安國中就讀時，外省同學很少，倒是外省訓導的暴力傾向、某些外省老師的不講理，令人印象深刻；不過，山東籍國文老師鄉音雖重，愛心不輸女老師。台中一中的外省同學不少，多來自中興新村，倒未構成壓力，反正，你們愛講國語（北京話），我們偏要講台語（鶴佬話），這是精神上的抵抗；不過，幾個外省籍的女老師倒是教學認真、沒有偏見，這才是真正的老師。

²⁷ 要特別感謝張良澤、以及遠景出版社。

²⁸ 其實，就同樣遭受列強勢力支配的經驗來看，中國與台灣、朝鮮（韓國）、以及安南（越南）可以相互提攜；然而，台灣人戰後無端捲入國共鬥爭，彷彿注定要以中國為定義台灣認同的最重要他者。荒謬的是，當冷戰時期的仇敵已經握手言歡、前者的恩怨情仇也大致獲得釋懷之時，台灣人卻被迫繼續當西太平洋的古巴，卻也是莫可奈何。

真正與外省人接觸較頻繁，是在大學時期；其實，很難區分同學是外省人、還是台北人，反正他們都愛說國語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國語人」。我們對國家體制內的東西都很討厭，他們則小心翼翼地捍衛著中華民國，不時仔細地在聽我們說甚麼、看甚麼書，儼如抱壁鬼一般。外省老師沒有明顯的歧視，卻似乎對外省同學特別好；在無形的「we vs. you」的藩籬下，蕃薯仔反正是歹命子，在怎麼計較也沒有用。

在「中美斷交」之前，我曾經幫陳鼓應發過傳單；是的，就是台大哲學事件那位教授，現在被當作是統派。當時看他與陳婉真聯合競選立委及國大，不知怎麼地，就為這種族群合作要打倒國民黨政權感動起來，後來，所謂「中央民代補選」被中止，人心惶惶，陳太太請所有的工作人員在台大前面吃火鍋，彷彿是最後的晚餐一般；看著可愛的小孩，我請她在萬一台北發生暴動、報復之際，一定要來找我，我會幫她們疏散到台中鄉下。當即被眾女將斥責，不要亂說話。其實，我只是想到當年林獻堂在二二八時掩護嚴家淦的故事而已。

應該談談當兵的心路歷程。我們那一夥人是百分之百不食周粟的反體制者，不要說參加高、普考，連台灣人聯考志願填國民黨校前身的政治大學，都會覺得是不可思議，因此，普遍認為考預備軍官是一件丟臉的事。未來的岳父是職業軍人，對我曉以大義，軍官可以學習當領導者、體會責任，我只好硬著頭皮考上預官。步兵學校受訓完畢，原本被分發到師部，「感謝」大學教官、或是班上的佈建（爪杷仔），一路被勸到最後一個營、最後一個連、最後一個排去²⁹。

營、連長不是官校正期出身，所有的怨氣都集中在我們身上，尤其是「歹底」的我，又碰上馬山連長叛逃事件記憶猶新，我既是「台灣」人、又是「台灣」大學畢業，在「台獨=黨外=中共」的「三合一」公式之下，當然會有事沒事被營上長官全副武裝罰站、或是叫去海邊立正站好聽訓。套句連續劇「台灣阿誠」的話，我是「把吃苦當作吃補」，只要能活著回台灣就好了；又想到一朝中國武力犯台，中央山脈比金門的小山還要陡

²⁹ 也因此有機會接觸病號、流氓、以及原住民的台籍士兵。

峭，當然要為未來打游擊戰作準備。我是那麼認真地在當排長，讓那些長官覺得不可思議，後來，他們還希望我志願留營！

我一直想當記者，等到要口試了，才知道是這個單位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竟然被錄取；迄今，我還是無法了解，憑我在大學及軍中的紀錄，怎麼會讓我進去。在中廣新聞部上晚班³⁰，主要工作是翻譯外電、偶而權充晚班次要時段的新聞編輯。那是一個百分之九十九為外省人的地方，有讓人渾身不對勁的文化，卻讓我有機會去了解外省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從福州籍師傅文公學到不少功夫。回想當年，每當把要稿送出去給編輯台後，只要六點新聞一過，大家作鳥獸散，就是我們晚班的天下；師徒二人兩天一瓶五雙鹿家皮，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了，再好的威士忌也比不上。每天從外電的新聞分析吸收資訊，私地在《生根》寫〈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〉、在《台灣年代》寫〈庫德人——世界的孤兒〉。我想，這時的民族意識已經開始萌芽成長了。

我老早已經忘了自己是農業經濟系畢業的，直到那天，報紙隱隱約約提到台灣大學的校務會議裡，有人主張要把農經系的「李登輝系友文物陳列室」掃地出門。「農經系畢業的能幹甚麼？」這是在 1980 年代初期，青輔會的職員不屑地問道。剛從金門退伍回來，人海茫茫，既無顯赫的家世，只好硬著頭皮去面試。在軍中雖然當預官步兵排長，由於大學時代的「偏激」記錄，卻被上面整得很慘。即使不再慘綠，卻仍有蕃薯仔的桀驁不馴：「農經系出來，是要當台北市長跟省主席用的！」工作自然是沒有著落。卻沒想到，李登輝先生日後會進一步當上總統，不然，我可以回答得更豪氣一點。

據說，當年的農經系主任嗤之以鼻：「連國語都講不好，還想當大學教授！」李登輝自然未能回母系任教，學生反而是以經濟系、中興大學農經系為多；這應該可以算是無言的抗議吧！？能說對台大農經系沒有貢獻？這當然是族群／省籍因素作祟。李登輝說「台灣人的悲哀」，為甚麼我們中生代教書的人，也頗有同感？外省族群在公家部門

³⁰ 除了自己的學生，我很少向圈仔內的人說，過去曾經在「中廣」待過。先前，在新聞局長葉國興的晚宴上，碰上以前的老同事，他當然不會記得我這個過客小人物；先前，中廣以學者的身分 call-out 訪問我，又回想起憲兵嚴格管制上下班的當年，啞然失笑。

裡佔有相對的優勢，尤其是在國立大學裡頭，這是歷史的發展，怨不了個人。誰人不曉，過去的大學校長是廣義內閣的一份子，是教育部長的踏腳石；國立大學某些系的教授身分，其實就是當官的必要前提，至於學術如何並不重要，血統純正才是真正的考量。反正，都是共犯結構的重要成員。

曾幾何時，李登輝沒有預警接任中華民國的總統、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、以及本土化，多少人學而優則仕的美夢被打碎了，尤其是那些當年由國民黨栽培，拿中山獎學金唸美國的長春藤名校，在海外參加愛盟、筆戰台獨者³¹。他們無法如願接班，除了對李登輝的恨，說坦白點，更有「寧予外人、不予家奴」的心態，充滿著強烈的族群偏見。

這股保守的政治力量，藉著冠冕堂皇的「校園民主化」，赤裸裸行多數暴力，毫不靦腆壟斷研究資源、操控校長選舉、威脅年輕的同事，誇耀爛熟的配票、買票、及綁標技巧，儼然如黑社會般，興風作浪，竟還荒謬地大談教師倫理。其實校園裡頭，最喜歡玩政治的就是這票人。好一個爲了「淨化校園」，因此要禁止政治人物的「實物公開展示」。試問，李登輝當初是不是以總統的身分，運用政治壓力逼迫台大設立文物陳列室？難道那些學術書籍都是政治圖騰？難道那座木雕是要我們馨香膜拜用的？說穿了，還不是爲了族群自我中心的政治考量。

自由而認真的日子

拼命工作了一陣子，白天當英文翻譯、晚上當外電編譯，半夜還偷偷幫黨外雜誌寫稿，也不過是麻痺自己罷了。每回聽到陳昇在〈歹子〉裡唱到「拚攔 bey 死攏抹贏」，就不禁憶起當年徬徨無助的光景。在 1984 年，千辛萬苦來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³²，

³¹ 譬如馬英九在哈佛大學編輯《波斯頓通訊》、以及中西部的《大漢風》。

³² 李登輝待過愛荷華州立大學。記得當時的校園報紙曾報導過，外國校友中成就最大的是蘇丹南部「叛軍」的頭頭，如果獨立成功，就有首位國家元首級的校友，與我有榮焉。若非中國作梗，當上總統的李登輝，應該也可以風風光光回愛荷華的母校吧？

我已打定主意，不想再讀農經了。近百年裡，外來統治者用盡好話來哄台灣人，就是不要我們唸政治學，我偏偏就要。

那年雷根連任總統，被校園的國民黨組織找去作報告。爲了護照上的回台加簽，又不能不虛與尾蛇。來自大都會³³的上級指導員撇頭問我：「台灣人唸政治沒有前途，你爲甚麼還要唸？」雖說是老實話，卻未免是得了便宜又賣乖。已記不得是如何搪塞、是否臉紅，但我已打定主意，任憑甚麼都阻擋不了我了。幸好有貴人相助，一路走來，大部分的時候都有獎學金，在 1991 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學（Ohio State University）取得政治學博士。

在白色恐怖時代，中國國民黨政權不只採取直接暴力（鎮壓、酷刑）、以及間接暴力（壓迫、榨取），還要進行不流血的文化暴力，也就是思想上的控制，站在台灣人立場的政治性書籍當然絕對無法在島內生存，因此，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責無旁貸，必須扮演啓蒙者的角色。對於這些離散的台灣人來說，在面對國民黨爪牙遣送回國的壓力之際，一方面要尋求他國友人義助，另一方面還要奔走四方、組織有志之士奧援，剩下的時間還要辦刊物、或是寫冊。不少人的台灣人意識、或是台獨意識，是在出國留學之後，讀完那些在台灣看不到的書而覺醒的。透過台灣同鄉會、或是同學會的洗禮，斑駁的書籍留給後來的人，台灣意識的香火一代接一代傳承下去。

在哥城俄亥俄州立大學唸書時加入台灣同學會、台灣同鄉會以後，我才有機會接觸到王育德的《苦悶的台灣》、以及史明的《台灣四百年史》³⁴；此外，還有主張台獨的《台灣公論報》、主張自決的《太平洋時報》、以及各種台獨刊物。當然，我也影印了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英文報紙、以及新聞性刊物。由於不懂日文，無法閱讀在東京出版的《台

³³ 大概是芝加哥、或是明尼蘇達州的雙子城。

³⁴ 其實，到出國爲止，我唸的台灣史很少，一本是連橫的《台灣通史》，另一本是呂秀蓮的《台灣的過去與未來》（人生真是奧妙）。如果說《苦悶的台灣》是另類台灣史的入門書，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就宛如一本台灣史的百科全書，由頭到尾提供巨細靡遺的資料來佐證，台灣人留學美國多半唸理工科，在嘆爲觀止之際，也就特別折服。《台灣的獨立與建國》則偏向政治層面的分析。史明除了寫書，還組織了「獨立台灣會」，並發行刊物。據了解，在戒嚴時代，島內的少年孤鳥到日本，多會以朝聖的態度專程前去「吃麵」，也就成爲私淑弟子。在 1980 年代，我身處北美，無緣相會，倒是在哥城唸書時，從同學會的學長接收了幾本散期的獨台會刊物

灣青年》。我是在 1980 年代中期加入台獨聯盟，推薦的是同鄉施忠男，由當時的主席張燦鑒宣誓；記得當年張主席曾經問我有何專長來奉獻台灣，我的回答是喜歡唸書，他說，那很好³⁵。在美國的最後一年，我擔任《台灣學生》的總編輯，連續四期用鮮紅色當封面，鼓吹台灣留學生應該熱血澎湃，也刊出加里波底的英姿，竟有人誤以為是共產黨的色彩；錯了，鮮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的顏色。

真正接觸到民族主義的學理³⁶，是在愛荷華州大唸碩士時陣。當時擔任 Olorunsola 教授的研究助理，主要的工作是作摘要，因此把 James Coleman 有關非洲民族主義的論文都看遍了，又不時拿別人的經驗來和台灣相比。在博士班時，除了修 Nagy 教授的民族運動理論，也跟 Shabad 教授研修巴斯克人的民族運動個案。當時，又與熱心的同鄉一起唸書，譬如 K. R. Minogue 的 *Nationalism* (1967)。不過，台灣人多半唸理工，對於太抽象的議題不太有興趣；台左雖然喜歡舉辦讀書會，卻視民族主義為落伍的東西。不管左右，同鄉宛如學子的父兄，而同鄉會更是孕育台灣人意識的溫床；在島內最困頓的時候，透過這些同鄉的解囊奔波，台灣人的香火得以保存。

學術研究的興趣與個人的主觀傾向往往是分不開的，我是這樣相信。當初（1986）獲得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系的入學許可，是以國際關係的專長進入博士班，因此也修遍了比較外交政策、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的課程。然而，卻也一直不能忘情對族群政治的關心，拼命地尋找相關的科目來修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能有助於調和台灣的族群關係。

再回首於愛荷華州州立大學（Iowa State University）的碩士班日子（1984-86），雖然按照規定完成了國際關係課業，卻對於系主任 Victor A. Olorunsola 交代的課題——非

³⁵ 不過，真正參與聯盟運作是回到台灣以後，大約在 1990 年代中左右。有一陣子，我幫忙編輯《共和國》，偶而也插花當沒有聲音的發言人。

³⁶ 所謂「民族」(nation)，是指一群人想要共同組成一個國家，也就是要以民族成員的身份來加入國家，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、或文化關係。這些，在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、或是史明的其他出版品都說明的相當清楚，而且與國際上研究民族主義的論述完全契合。目前在台灣，唯有史明、以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張「台灣民族主義」(Taiwanese nationalism)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台灣人在世界委實是一個特例，也就是有一個現成的國家（中華民國），一方面不置可否，一方面又對於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習以為常，更奇怪的是尚未普遍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。

洲民族主義的發展——情有獨鍾³⁷。在準備論文題目之際，指導教授 Charles F. Hermann 看到我的掙扎，建議我找未來的恩師 Chadwick F. Alger 談談，終得以順利在國際關係下的「超越國際關係學」(Transnational Relations) 找到出路，完成了博士論文《族群多元化與政治暴力行爲的多變數模型》。其實，稍早的碩士論文，也是在指導老師 James M. McCormick 包容下所做的暖身。

這篇博士論文採取量化的途徑，因為這是當時國際關係領域不成文的要求。不過，除了科學哲學上的信念外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的考量，希望透過超越國家 (cross-national) 的實證，避開有心人士以放大鏡來檢驗我的思想，以免他日被迫流亡海外、終究只能在台灣人聚會上高唱〈黃昏的故鄉〉而掉眼淚。其實，序言中還是不免洩漏了天機，表達了對台灣人追求實踐民族自決權的無限嚮往。筆者這幾年來有關族群、民族認同的研究，大致上是依循上述的模型不斷地在作驗證：主張主觀上的認同重於客觀上的共同基礎，同時強調菁英扮演的關鍵性角色。

記得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，系上的國際政治經濟老師 Brian Pollins 問我：「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是甚麼？」乍聽之下，他的問題有點沒頭沒腦，因為，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如何獨立做研究，如果不是爲了研究作準備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？話又說回來，台灣的讀書人往往有「仕而優則學、學而優則仕」的想法，以爲拿到博士就好像考上狀元，從此，一輩子要輝煌騰達，好像是如不當官、就未免對不起自己。也難怪，戰後台灣唸政治學的不少，不過，留在學術圈子的好像並不太多。³⁸

在留學的日子裡，我逐漸把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心境、轉爲正面追求台灣的獨立建國的情懷，也就是試圖將個人的認同與民族的認同結合爲一。課本上所學的告訴我，如

³⁷ Olorunsola 老師是奈及利亞裔，一度希望我能留下來當系上博士班的第一個學生；後來，他被挖角到肯塔基擔任院長時，還問我願不願意繼續追隨他前去作研究。當時，由於一心想與在伊利諾大學 (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-Champaign) 唸農業經濟學的愛妻會合，尋覓同時有提供獎學金的學校，終於一起來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倫。

³⁸ 我當時的回答是這樣子的：如果能到大學教書最好，才能繼續鑽研留學七年所學到的東西；再來，我希望能學以致用在台灣獨立運動；最後，我不能忘情的是出國前的一段短暫編譯經驗，因此，希望能再透過刊物進行解構霸權、以及啓蒙的工作。

果內部多元族群無法取得和解，對外的國家主權定位就很難有共識。在嘗試尋找台灣政治在歷史中自我定位的企盼，謙卑地表達身為台灣人的我們，雖然曾經自我流放離散，卻仍執著要當台灣國民，這種超越一切的情愫，恐不是陳水扁等急於擁抱中華民國（國民黨）體制的民進黨諸君所能體會。

由農經 e 到政治學者

原本，我答應前民進黨主席江鵬堅，如果能僥倖回到台灣，大概不會有學校敢用我，因此，會到台灣國際基金會。沒想到，最後，竟然讓我在 1991 年進入淡江大學任教（1991/9-2008/2）；當安全資料送到淡江之際，想必是嚇壞了不少管理階層的人。在回國將十多年期間（好快！），我原先一直待在淡江，儘管自知不是純種的淡江人，也就是說，不是淡江大學部、或是研究所畢業的，有點像是所謂的「外省人」，既想要定下心來，卻又徬徨不知被當作是甚麼，點滴在心頭。原來，即使再堅強的人，仍然有認同／被認同的需求。³⁹

在學成回國十年之際，在短短地半年裡，我先後兩次婉拒直接踏入政治圈。我與內人反覆討論，台灣還有許多政治現象有待釐清；此外，目前對於學術的邊際效用最高，除了有很多機會寫論文，而且寫得出來，更是寫得起勁。如果學者的責任有教學、研究、以及服務，我當時自忖，至少還要再寫十本書才有可能履行研究的義務。對我來說，正如有必要的時候，我願意加入軍隊，為保衛台灣一戰；同樣地，如果有一天，真的必須要離開學術界，那將是一項神聖的任務。

政權、政黨、或是政治人物來來去去，唯有學術真理、自我良知才是永遠的。在「建國廣場」的一次募款餐會上（海霸王），主持人紛紛上台自我介紹，其中一位少年兄表

³⁹ 因此，當張老闆（正確的說法是「張建邦創辦人」）在被提名為監察院長後而被泛藍立委修理之時，我義無反顧地在媒體辯護，多少也有一點是飲水思源的緣故。其實，離開淡江，我還有一個在心理上沒有辦法解釋的結，也就是當我一再跟學生說，私立學校未必比國立的差（我自己唸過台大），為何卻也要靠前往國立大學來肯定自己？只可惜，校長張家宜對於借調東華的請求，回答「我們只有借調當校長，沒有當院長的！」只不過，她忘了，向來只有公立大學借調私立大學。

示，他當年就是聽到我在「TNT」（寶島新聲）的呼籲，日後轉讀政治學。真想不到，當傳道者的老師，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，而且，如此快就會看到應驗。我還是要重申：「一流的民族，一流的人才愛（應該去）讀政治學」。過去，宰制我們的是殖民者、外來的統治者，現在，欺哄我們的是三流的政客、政治撈仔。人家說，音樂素養需要三代的培養，我以為，政治修養也如此。如果說日治時代與國治時代的一百年，代表台灣人先行者的不同政治參與模式，那麼，在二十一世紀，我們應該有絕佳的機會，將政治運作提昇為民主的藝術。

朱約信問道：「na（如果）沒為台灣、博士 bey（要）chong 啥（有甚麼用）？」坦白說，我不敢說自己是稱職的政治學者。當然，就台灣目前的所謂「客觀的」評分標準，我當然是不夠格的，特別是既不申請國科會的計畫、沒有 SSCI/TSSCI 的論文、又老是寫那些「一個晚上就寫得出來」的文章。不過，對我來說，那些宛如科舉制度般的緊箍咒，是用來刺穿我們鼻孔的後殖民結構、是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性暴力；對於這些奢侈的東西，只要我們不自我欺騙，就可以大膽地不屑一顧。然而，光是這樣消極抗拒就夠了嗎？除了拒絕在學術審查之際當鄉愿，是否還主動地把任何政治課題當作學術研究的挑戰？顯然地，在年過半百、步入中年以後，除了說力不從心以外（尤其是唸書的速度），而時間永遠是不夠地。

作一個讀冊郎（知識份子），我至少還可以相當自豪，迄今仍在專業上對自己坦白，隨時挑戰國王的新衣。如果說我在青年時期就膽敢面對國民黨體制，現在卻因政權轉移而失去了原有的理想，除了貪圖榮華富貴外，又要如何自圓其說？我台中一中的前輩（學長）許世楷笑道：「〔別〕人攏是私底下 *de* 講，*gana*（只有）你寫作（成）文字，走 *bey* 去（躲不掉）。」這應該算是讚許吧！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告訴我：「你真有可能 *ei*（會）大失敗，但是，*ma*（也）有可能 *ei*（會）大成功。」當然，成功與失敗，還是決定於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。

如果說我們的前輩在日本時代、以及國民黨時代分別奮鬥了五十年，那麼，以 1995

年爲界，不知到 2045 年的時候（民進黨時代？），台灣能真正享有獨立建國嗎？如果說留日的黃昭堂、許世楷、侯榮邦等人可以用四十年的生命辦《台灣青年》，那麼，吾輩應該至少還要奉獻二十年以上。只能誠摯地寄望年輕的學者，能以天下爲己任（聽來雖是陳腔濫調），將棒子接下去；當然，更企盼有更多的學子投入政治學的行列。

建構多元文化的國家

這些年來，我以爲，台灣人若要進行民主鞏固，一定會面對三大課題：「國家肇建」（state-making）、「民族塑造」（nation-building）、以及「國家建構」（state-building）。所謂國家肇建是指對外積極尋求及獨立自主，前提是內部的民族塑造是否成功，具體而言，住民是否自認爲是一個民族？彼此是否想要共同組成一個國家？也就是說，國家的存在建立於民族之上，此即「民族國家」（nation-state），否則，國家的主權（sovereignty）、以及政府的正當性（legitimacy）勢必會不斷遭到來自內外的質疑、挑戰。

我的立場很簡單，台灣若要獨立建國成功，一定要獲得所有族群的支持，否則，難保不會出現另一個北愛爾蘭、或是北賽普路斯。此外，民主是要講求政治深度（political sophistication）的；如果說過去的少數統治不合公義，倚多爲勝也不是真正的民主。長期以來，由於堅持自己的看法，不時因爲言論不符「政治正確」而被扣上各種帽子，從新黨、國民黨、親民黨、到共產黨都有；有趣的是，不少人認爲我是建國黨、新國家連線、或是台聯的人。都錯了，我迄今連民進黨員都不是，因爲，我不願意讓台灣獨立的目標因爲選舉競爭而被打散了。

那麼，民族又要如何來塑造？如果我們接受 Benedict Anderson（1991）的說法，民族是一種「想像的共同體」（imagined community）的話，若要超越客觀的本質差異，發展成主觀上的共同的認同，除了端賴眾人是否對於過去的認知能獲得妥協，更取決於大家對於未來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以及文化制度，是否能達成起碼的共識。就政治學者來說，政治制度的改革／建構是我們不容推卸的天職；如果醫生可以診斷而開藥方，

為何政治學者就只能觀察與分析？

我一直相信，台灣若要真正成為現代國家，一定要是要由多元族群組成的民族國家 (nation-state)，而非由任何單一族群所支配的族群國家 (ethnic state)、或是族群化的國家 (ethnicized state)；如果鶴佬人能與客家人進行歷史和解 (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)，一定會有示範效果，也就是非原住民與原住民、平埔族與高山族、以及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和解，甚至於，擴及本地人對於新移民 (外籍、或是中國新娘) 的接受 (圖 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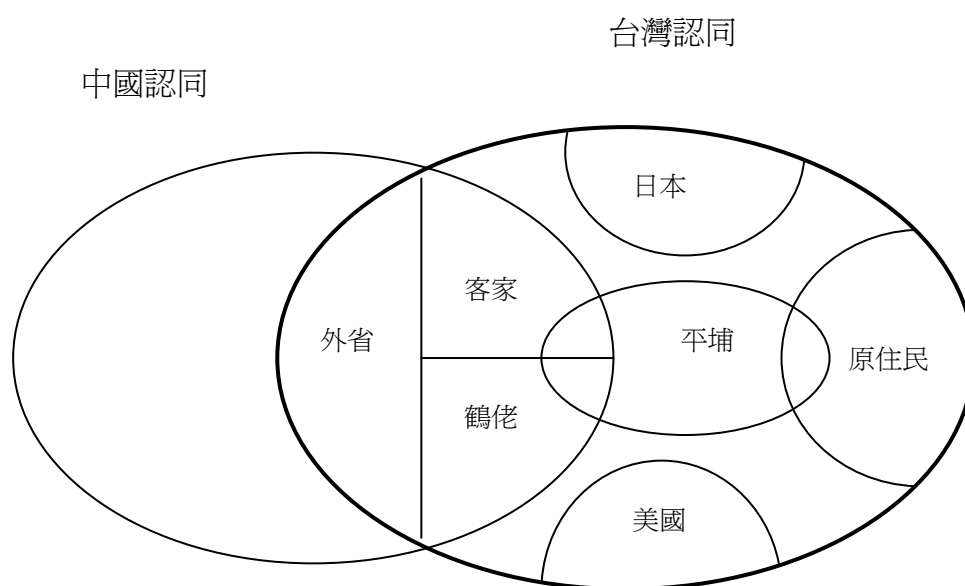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多元文化的台灣認同

在我的想像中，在這一個多元族群、甚至於是多元民族的墾殖社會 (setter society)，也就是除了原住民以外，還有不請自來的墾殖者、以及不同梯次的移民者，自然會有多元的民族認同／國家認同如果要凝聚出生死與共的台灣民族認同，必須在原生面向符合多元文化主義 (Multiculturalism)，每個族群的文化特色都是一樣地重要；必須在結構面向依據憲政主義 (Constitutionalism)／自由主義 (Liberalism)，也就是保障每個人的自由；必須在建構面向要求共和主義 (Republicanism) 的實踐，也就是公民必須參與審議民主的過程。最後，總其成的是台灣的民族主義 (Nationalism)，也就是生活在一起

的意願（圖 2）。當然，即便是大家願意生活在一起，各個族群對於這個國家的想像，不一定會全然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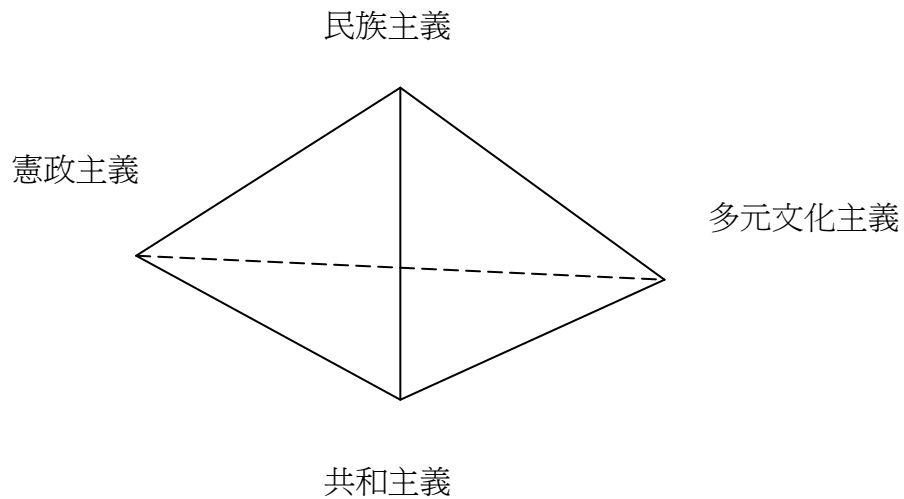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多元族群國家的認同整合

參考文獻

- Anderson, Benedict. 1991. *Imagined Communities: Reflections i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*. rev. ed. London: Verso.
- Grande, Sandy. 2000. "American Indian Identity and Intellectualism: The Quest for a New Red Pedagogy." *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*, Vol. 13, No. 4, pp. 343-59.